

百家譚

陈平原

按惯例,临近除夕,我都会发信问候国内外亲朋好友。去年2月4日下午,当我开始用电子邮箱或微信发送贺年卡时,突然意识到,有七个地址/号码已经无法送达,当即心情黯然。而这,还不包括我已撰文怀念的汉学家瓦格纳和著名诗人杨牧(参见《瓦格纳:为学术的一生》,2020年3月13日《文汇报》;《一次致敬式的对话》,《告诉我,甚么叫做记忆:想念杨牧》,台北:时报出版,2020年9月)。

依旧岁月匆匆,不断有师友隐入历史深处。因疫情缘故,这两年取消了告别仪式,以往那种刻骨铭心的“伤逝”场面,逐渐被网络上众声喧哗的“怀人”文/图所取代。如此转化,不知不觉中,悲伤的意味减少,而无奈/无力感则陡然升高。我明显感觉到,那些对我等凡人十分重要的“记忆”,正从手指缝中溜走,悄无声息。

今年春节来得早,今天就开始筹备发送贺年卡了。此前看过2021年12月22日《中华读书报》的《2021永远的怀念》,35位去世的人物中,竟然有11位是我比较熟悉或有一面之缘的。我不擅长即兴写作,而且相信鲁迅的说法,感情正烈的时候不适合写诗;但我关注各类怀念文章。读来读去,凡有很多好文的(如沈昌文、王信),我深刻认同,就此搁笔;而声望如日中天、去世后媒体上铺天盖地追怀的(如余英时、李泽厚),我虽私下感念,因关系没到那个份上,谢绝撰文,怕说多了有攀附的嫌疑。

倒是以下四位先生——2020年12月11日去世的孙逊先生、2021年1月15日去世的吴福辉先生、2022年1月4日去世的戴小京先生,以及2022年1月16日去世的姜寻先生,年龄悬殊,专业背景不同,贡献及名气也有大小,跟我的关系更是很不一样,但都有值得一说的地方。考虑到四位的成绩及人品,都有各自单位、亲友或弟子专门介绍,这里就说说我与他们的交往,琐琐碎碎中,或许也能见其真性情。

二

忘记是哪一年初次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孙逊(1944—2020),但首次合作始于1997年,则很明确。大概是外出游玩其乐无穷,懒得写日记了,如今只留下“9月25日赴上海,10月5日由南京返京”的线索/印记。南京只是稍为停留,就为了拜访程千帆先生,这在《掬水集》小引》中提到了。主要部分是在上海师大,记得是集中讲义,讲什么也忘记了,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。

唯一记得的是,人高马大的孙逊教授竟然心细如发,刚讲了一课,就很体贴地问我:“这次单独外出,是不是得给夏老师买点礼物?别的就不要了,弄几块古玉如何?君子佩玉,很适合夏老师气质的。与其带回去几千块钱讲课费,还不如奉上几块古玉,你说呢?”

看我点头称是,孙教授马上趁热打铁:“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上海市文物商店,已经替你看好了三块明清古玉,质地不算很好,略有残缺,但都经过专家掌眼,有鉴定证书。价钱呢,已跟店里谈妥了,就用你的讲课费。”

此前我曾在新疆买过假的和田玉,被妻子严重警告:不要不懂装懂,别乱买东西了。这回有孙逊紧急补课,普及收藏诀窍以及玉石的基本知识,再加上出自文物商店,不会离谱的。回家拿出一周劳动所得,果然大获表扬。直到今天,这三块不算珍贵的古玉,还时常陪伴我们外出游览。

以后交往多了,才知道孙逊不仅是个著名学者,还是个颇有经验的收藏家。据说最初上手时,瓷器、玉石、印章等什么都收,有些杂乱,后来才逐渐集中到明清文人字画。因宋元字画太贵,明清还勉强跟得上,而且不求多,求贴近自己的专业。

在《收藏结合自己的专业最开心》(2015年3月3日《文汇报》)中,孙逊称:“如果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,能有机会收藏到他们之中一部分作品,哪怕是很少一部分,那该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!怕它们集在一起,岂不是一部可以摸到古人脉搏跳动、感觉到古人体温的明清文学史?”据说他在上海师大教中国文学史课,讲到明清段,每个重要作家都能秀出点宝贝来。无论对于老师还是学生,如此古今对照,直接触摸历史,当然是大有裨益。

对他的藏品,惊鸿一瞥后,我不再过问。不是不信任,而是怕被诱惑。我知道这里的水很



孙逊



吴福辉



戴小京



姜寻

深,一旦介入,需要金钱,更需要时间。我没有这个财力与定力,只好眼不见心不烦。但若处理得好,拿得起放得下,那确实有利于养成学识与性情。我的北大同事潘建国教授是孙逊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,曾撰《无言之美——纪念恩师孙逊教授》,讲述孙逊收藏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书扇合册,借此度过人生最困难的时刻。“后来,他请苏州老裱工重新精裱了册页,请沪上著名画家刘旦宅题签‘容若梁汾书扇合册’,又特意来到北京,请冯其庸先生、袁行霈先生分别题写了引首‘词坛双璧’‘千古高义’。”

我所接触的孙逊,主要是其学术策划与组织方面的才能。至于他论《红楼梦》及东亚汉文小说方面的著作,自有专家评说。1996年,上海师大成立包括中文系、历史系、古籍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四个单位的人文学院,孙逊任首任院长。作为一个地方院校,申报博士点,争取重点学科,延揽杰出人才,拓展研究领域,乃至推荐新人获奖等,这些琐细而艰辛的工作,需要有高屋建瓴且大公无私的人来认真规划与推动。十三年的人文学院院长任上,我看着能屈能伸、不卑不亢的孙教授不断进取。近年上海师大文科实力的增长以及声誉的提升,应该说与孙逊的不懈努力分不开。卸任院长后,他又主持或参与了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-研究院、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等成功运作。直到重病缠身,他仍关注上海师大人文学科的发展,竭尽全力扶持年轻学者。去世前一个月,给我发微信,还在谈这个话题。

因妻子夏晓虹退休后受聘上海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,我连续几年到上海师大做讲座,2016年12月5日讲《大变动时代的图像叙事——晚清画报三十年(1884—1913)》、2017年4月24日讲《鸚鵡救火与铸剑复仇——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》、2018年3月26日讲《声音的政治——现代中国的宣传与文章》、2019年3月19日讲《学术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》,前三次都是孙逊亲自主持并做精彩点评,最后一次,他用嘶哑的声音简单开了个头,就请朱莉华代为主持。看他身体实在太虚弱,我给他发微信:“孙老师,今天天气不好,请在家里休息,不用出席夏晓虹讲座。”他的回复是:“谢谢!我今天上午在家休息,中午11点半仍来陪你们外宾楼用餐。”我相信,很多学者之所以乐意与上海师大合作,与孙逊教授这种谦恭与体贴的性格大有关系。

三

今年的1月15日,我在朋友圈贴出三张照片,还有下面这段话:“去年今日,接到吴福辉在加拿大去世的消息,我赶紧告知几位师兄师姐,略为商议,发去唁电:‘惊悉老同学吴福辉不幸病逝,我们都深感悲痛!请夫人节育节哀顺变,保重身体!钱理群、赵国、温儒敏、凌宇、陈平原、’前四位确实是老吴的同学,我属于师弟,但经常在一起活动。作为一个外省青年,我之所以一到北京就如鱼得水,除了导师的荫福,还得益于这些学问及人品都很好的师兄师姐们的提携。老钱、赵国抱怨,知道老吴要去加拿大,可走前为什么不专门道别呢?我说不对的,2019年9月3日给三位寿星祝寿,9月9日欢迎日本朋友聚会,老吴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。只是离愁别绪,你让人家怎么说?而且并非一去不复返,日后还有的是见面机会。可找出那几张照片,仔细观照,老吴招牌式的微笑中,不无几分哀怨。怀念远去的师兄!”

我的师兄吴福辉(1939—2021)是中国

现代文学馆最早的筹建者之一,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主编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。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身份,对他来说更重要,那就是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。当年河南大学与现代文学馆联手申请博士点,对双方都是一大利好。此前,老吴曾多次对我说:“你们在大学教书,真幸福!”因为,考上北大研究生前,老吴当过多年中学语文老师,教导主任,教书在他是本色当行,也是兴致所在。这几年我与河大文学院接触较多,那里的老师谈起我的师兄,莫不交口称赞。老吴去年1月在加拿大去世,8月河大文学院举办了“吴福辉先生追思会暨吴福辉先生纪念文集”发布会”,这都在情理之中。

老吴学问做得最好的,是海派文化论述(如《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》),而非早期的讽刺文学研究(如《沙汀传》《带着枷锁的笑》)。但我在中山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《论四十年代国统区、沦陷区讽刺文学》(1984),明显是受他《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》(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6期)的影响。见面时谈及这点,他很得意。三十多年间,作为师兄,老吴对我倍加关照,只是因学术风格及生活品味不太一样,平时交往并不频繁。

2019年9月的两次聚会,第一次是学生操持,第二次才是我发起。老吴很开心,和夫人朱珩青一起参加,回去后还发来他拍的照片,嘱咐我转给各位。那两次活动确实没提及移居异国事,他不想多说,我们也不便多问。多年的老朋友了,相互间达成默契: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尊重别人的选择。因微信联系很方便,久而久之,我竟忘记了他已人在异国,2020年4月30日给他发信:“制作一册《手稿集》,若有兴趣,请发来接收地址及手机。”他当即回复:“手稿集可以考虑。但我现在人住在加拿大儿子这里,因疫情今春按计划回国已不可能。那就再联系,有关事宜可在微信上谈的,也可先交流一下。”过一会又会来:“平原,如你所说得回京时再议吧。国内疫情好转,加幸亏边境封锁紧,与美切割成功。目前高峰还未至,但确诊病例每日总算稳定。我是坚不出门,和儿子本来就是分开住的,所以平安无事。你和晓虹多多保重!”

各自都忙着防疫,日子过得很匆忙。2020年5月27日晚上23:56,老吴发来《百年翩跹》,那是他几年前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的散文,当时读过我就点赞了。这回估计是“文汇报笔会”微信推送,他马上转给我,显然希望我重读。此文提及他们家族的历史:“我们这个家,从由甬入沪算起,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计30年;从上海到东北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也是30年;再由1980年代至今整整40年:正逢一百一年!”而他自己,更是在回顾家族史的同时,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:“在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,发现、挖掘了海派文学,触动了我对甬沪两地固有的‘情结’,调动起童年的生活记忆,写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说研究专著。我从学术专业上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。”老钱、赵国和我都认定,老吴研究海派文化,之所以让我们望尘莫及,不是因为他勤奋,而是他带着寻根的深情,故能格外体贴入微。

四

今年1月4日晚上,看到我的大学同学、上

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戴小京先生(1952—2022)因病去世的消息,我着实大吃一惊。因为,不久前还有工作联系——虽说是拐了个弯。

事情是这样的,去年12月13日,我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王培楠来信,说为纪念毕业40周年,他想将一直珍藏的全套《红豆》杂志7本以及一册《这一代》,还有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公章一枚送给中大校史馆,特意拟了段说明文字,希望我抄写,以便在校史馆展出。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山大学的学生刊物《红豆》及钟楼文学社,主编苏炜多次撰文,我也在《怀想中大》(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14)中有所涉及。王培楠当年是钟楼文学社社长,此文学社的主要工作就是主办《红豆》杂志,而我则是《红豆》负责文学评论的编委。去年我在广州办“大字书”书法展,他和好几位老同学专门跑来助阵,缘于此,才有让我抄写说明的动议。

培楠的简要说明写得很好,但让我抄写明显不合适。因那是给校史馆展览用的,纸张不能太大,而我们班同学中,小楷写得最好的,当属上海的戴小京。当年在中大念书时,他常向容庚、商承祚请教,且坚持每天练字,是我们同学中书法功力最为深厚的。2017年12月,中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回母校聚会,纪念恢复高考以及入学四十周年,人来人往,很是热闹,小京把我叫到一边,略为交谈后,塞给我一把扇子,说这里人多,回去再打开。这是一把洒金折扇,上有小楷书写的苏东坡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真是漂亮。念及此,我建议培楠找戴兄抄写这段说明文字。

培楠兄一听,拍案叫绝,因他手头正好有一张老照片,证明小京也是《红豆》重要一员:“从照片留下‘红豆编辑部同人合影’字样,显然这不是随意抓拍,而是一次有意义的合影。从合影人员构成看,这明显又是《红豆》负责日常编务的核心工作班子。当中有七七级五人(陈平原、苏炜、毛铁、戴小京、王培楠)、七八级(刘浩、辛磊)、七九级(罗昌松)。还有两位,当中应有七九、八〇级,是编辑部联系当时四个年级的负责人。从时间看,1981年10月22日,显然又是我们毕业前夕了。我想这次把这张照片一同送归学校,您看呢?戴小京已答应抄说明,我等他寄来。我想,您是位大学者,又是《红豆》核心亲历者,能一同给母校留个‘大字书’的墨宝吗?这样,校史馆若开个《红豆》小展柜,阵营就不那么单薄了。”

我辞谢了赠送母校书法作品的建议,因同学中擅长此道的很多,轮不到我出头。12月22日王培楠又来信:“平原兄好!小京的墨宝已寄到。校史馆说,没有收藏您的《怀想中大》。这次,是否可给他们送些书?”中大图书馆藏有我不少著作,校史馆因刚从图书馆独立出来,藏品及展品稀缺,号召校友们多多捐赠,此前我并不知道。赶紧挑出若干近著,连同《怀想中大》,寄给王兄,请他转交中大校史馆。

正欣赏着小京抄写的《红豆》说明文字,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,惊诧之余,我当即给培楠去信:“实在让人难以置信,十几天前,你发来他抄写的向中大校史馆赠送《红豆》的那则短文,看不出任何病态,怎么会突然去世了。大概,同学年纪渐大,此类事越来越多,不胜悲伤。最难得的是你请戴小京抄写关于《红豆》的说明文字,如今竟成绝笔。”培楠回复,已将所有图书连同小京的书法交给了中大校史馆,小京那份捐赠证书日期为2021年12

月30日:“他是用此生的深情,在临终前,代表七七级,给母校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墨墨!”

五

我与前三位故人,交往不见得都很密切,但起码认识二三十年。而结识模范书局创始人、诗人、雕版收藏家姜寻(1970—2022),只有短短两年时间,而且还是疫情期间。可想而知,我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,只是因他去世太过突然,“是库房搬书的过程中意外身亡”,我觉得非得记下几笔不可。

2019年年底,北京电视台编导王宇制作《我是规划师》第一集,约我客串出境,在永定门、正阳门等处取景,念了几段我《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》(北京:三联书店,2008)中的文字。这种现场表演,非我所长与所愿,但为了老北京,我还是勉为其难了。没想到2020年1月8日又接到王导来信,说还要补拍些我在城南的镜头,地点就选在杨梅竹斜街的模范书局。看我很不情愿,对方极力劝说:作为拍摄点,那是一个很有历史氛围的地方,而且主人很有趣,相信你去了会喜欢的。

那是个冬日的上午,风很大,天气很冷,但随摄制组走进书店,确有温暖如春的感觉。书店不大,略显拥挤,稍有顾客,就转不过身来,但氛围很好,尤其是那几部主人制作的雕版诗集,难得的兼及技术、审美与岁月沧桑。姜寻把我们领到二楼的书房,看他的收藏,签了若干他收藏的我的著作,聊了聊各自的文学观,以及对雕版印刷的感觉。谈得很开心,几乎把拍摄的事忘了。不知不觉中,太阳照进阁楼,站在窗前,俯瞰旁边的平房,老北平的韵味一下子上来了。看我赞叹不已,姜寻赶紧推荐自家在西城区佟麟阁路的“模范书局+诗空间”,说比这更有味道。那里原本是中华圣公会教堂,始建于1907年,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如今被他改造成书店,成了文青打卡的最佳去处。当时一拍即合,就在那里举行我的新书发布会。

几天后我去信:“姜寻兄,那天谈及在模范书局诗空间开我的《想象都市》等四本新书发布的可能性,承蒙你一口答应。可三联认为放在他们刚重新开业的韬奋图书馆中更合适。得便再向你请教版刻及装帧问题。”接下来,我们围绕三联图书及其装帧等,略为交流了一下各自的心得。

同年1月16日,姜寻来信:“我想,继续绕公雕版诗集出版之后,一直没有更好的雕版诗集。模范书局邀您主持精选出版当代雕版系列丛书。”我的回复是:“谢谢邀约。当代雕版如何做到内容与形式相匹配,且有一定的市场,需仔细斟酌。”几天后,他专门来访,讨论此事的可行性。我特别欣赏他赠送的《饶宗颐诗钞》(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),那书最后一页是:“岁在壬寅十二月,于京师煮雨山房开雕,姜寻工作室辑宋黄善夫《史记》刊字,扬州陈义时刻。”总共二页(双面),售价1500元。严格说来,如此精美的图书,已经进入艺术品范畴。将文学阅读与非遗保护结合起来,制作典藏版的图书,这是个好主意,但必须顾及读者趣味及接受能力。

姜寻以他集宋本《草窗韵语》字、请扬州中国雕版文化传承人陈义时先生雕版的北岛诗集《一切》(中华书局,2017)为例,论证事在人为,此路可以走得通。那书一函两册,定价5000元,据说卖得还不错。我则坚信新诗人中北岛的地位很特殊,加上此书销售借助很多文化活动,是个特例。如此制作雕版图书,很难持续。我建议他每种诗文集就刻两页,雕版作为艺术品销售,其他部分同样集宋本但电脑制作,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,让“雕版图书”(而不是非遗产品)真正复活。作为诗人兼艺术家的姜寻,理想主义色彩极为浓厚,对我如此向市场妥协,表面不说,心里估计大不以为然。当然也可能他是因为紧接着武汉疫情暴发,大家都无暇他顾,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同年三月间,姜寻送来若干种特纸,说是模范书局天桥店开张,政府有关领导要去检查,若评价好,可以补贴若干运营经费。因此,希望我题写“戏剧人生”,放在店里,权当点缀,也算是一种支持。

此后,我与姜寻的联系,仅限于互相问候,以及贺年、赠书等。说好的参观导览“模范书局+诗空间”,则因各种缘故一再推迟。如今,这一切都成了梦幻。除了惋惜其英年早逝,再就是挂念他的雕版以及书店事业,真希望后继有人。

2022年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横城反击战,涌现出了一对耀眼的“双子星座”。33岁的邓岳指挥第40军第118师大胆穿插、断敌后路,毙伤南朝鲜第八师十六团团长权泰顺以下656名,俘敌2178人。毛泽东称誉邓岳为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”。34岁的张竭诚则率领第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:激战1小时,歼敌3350人,俘敌2500人,其中俘虏美军800人……后来,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——第38军、第39军军长。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时,已是当年的4月21日。志愿军伤亡4.2万,歼敌5.3万。虽然主动撤出了汉城,但“联合国军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:平均每天死伤近千人才前进1.3公里。李奇微后来回忆:“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,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,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,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。”

这一天,是当年的谷雨。“雨生百谷”——新中国第二个春天的播种季节,到来了。